

● 世界历史

美国“先德后日”战略的初步实施 与中国抗日战场

韩 永 利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韩永利(1954-),男,湖北沙市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和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摘 要] 美国在北非地中海开始实施“先德后日”战略并取得成功,与中国所付出的战略代价和所作的战略支持密不可分。这期间中国战场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没有减低,反而因盟国战略投入的不足而战略责任更加艰巨。中国战场的保持仍然是美国实施全球战略的基本前提之一。

[关键词] 美国;战略实施;中国战场;战略作用

[中图分类号] K712.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3-0328-07

美国于 1942 年中期开始着手实施“先德后日”战略,运筹和进行战略打击德国的第一步:北非地中海战役。美国能将战略重心放在西线,除西方一些著述所论及的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方面的有限反攻原因外,中国战场所作的牺牲,中国战场在困难中的坚持也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

1942 年中期太平洋局势稳定之际,美国就开始逐步将重点转移到战略主要方向——德国方面。而战略实施的第一步就是首先弥合盟国东西方战略连接的枢纽之地,从中东地区清除德意势力,彻底破灭德日中东会师的企图。5 月 19 日,罗斯福在给丘吉尔的电文中许诺:“美国将增加在中东的空军力量。”^[1](P. 227)美国军方最终确定首先将战略攻击的重点放在北非地中海方面,实施“体育家”计划^[2](P. 419—423)。7 月 15 日,在给马歇尔赴英谈判的要点中,罗斯福规定:1942 年放弃和推延准备西欧进攻的“大锤”和“波列罗”计划,将美国运往英格兰的全部飞机中的大部分运往中东和埃及,小部分运往西南太平洋;延缓 5 个师到英格兰,加快 5 个师到中东^[3](第 464—465 页)。7 月 24 日,美英军事参谋首脑伦敦会议确定实施“体育家计划”并报告罗斯福,罗斯福马上回电,同意尽快进行(北非登陆)“以挫败德国的空军集中行动”^[4](P. 611—612)。8 月 21 日,美英联合拟定“火炬”计划大纲,目标为:联合陆、海、空部队进攻阿尔及利亚地中海沿岸,首先占领突尼斯,在法属摩洛哥集结力量以保证对直布罗陀海峡的控制,如需要,进入西班牙属摩洛哥^[5](P. 227—231)。8 月 30 日,罗斯福致信丘吉尔,表示对“火炬”计划的细心思考,并说,“尽早开始这一进攻是他最紧切的愿望”^[6](P. 583)。在 9 月的一封未发出信中,罗斯福谈到“火

炬行动”的三项意图,并请丘吉尔修改后给斯大林:第一,从俄国前线转移德军;第二,使德国空军转向对付美英的进击,加强盟国从吉尔伯特到波斯湾的地位;第三,可将经波斯湾运往苏联的物资增加3倍^[6](P.611—612)。这样,中东的地位和在该地的战略行动在罗斯福的战略思考中就比阿卡迪亚会议时更明晰和更具体,并成为美英联合具体实施“先德后日”战略的重要第一步。

这一战略目标的选择据美英联合参谋首脑会议文件的记述还有以下几方面的意图:第一,这是美国“先德后日”战略具体实施的开始。第二,这是实施“先德后日”战略攻守兼备的目标选择,即:既弥合了盟国自身的战略“链”,盟国再无需为战略构架会被轴心国中间突破而困扰,同时也因首先打击中东之敌,可以建立一个分割德意日战略联系的战略地带。第三,从迅即的效果来看,也支持了苏联的对德作战。美英首先从北非、中东地区实施战略行动,将会保证苏联战略物资供应线的畅通,同时也将缓解苏联南部的压力^[1](P.330—332)。第四,首先从事北非登陆作战无论是对手,还是兵力物资的投入方面,都比从英伦三岛首先开始进攻西欧德国正面的压力和需求要小,容易制胜。

美英在北非实施了成功登陆之后,1943年1月3日,美英在召开的卡萨布兰卡会上拟定了第11号战略计划,其中对北非登陆后的战略形势的估计是:我们盟国的资源已经增长到能从德国和意大利手中夺取主动权的地步,而且可以在西南太平洋阻止住日本。战略文件中宣布:“堵塞漏洞的日子已经结束。”关于“日本对印度的威胁”,文件第2条(c)款中估计:“假如日本与德国仍处于分割状态,那它就不可能再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关于“战略投入”,文件第3条指出:“联合国家的资源不能支撑同时打败德国和日本。因此我们必须选择集中力量打败德国,而稳住日本。”该条的(a)款进一步阐明了美英进一步实施“先德”战略的立场和具体计划。罗斯福提出一方面在英国集结美英军队,准备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另一方面继续实施地中海作战,稳固已取得的战略地位。罗斯福认为,“地中海行动看来是较好的抉择。……可以进一步保障盟国船只在地中海安全航行,而且也许使动摇的意大利退出这场战争。”^[7](第393页)会议最后决定:对西西里岛进攻订于1943年7月,或者愈早愈好。目标是:1.进一步确保地中海的交通线;2.将德国的压力从苏联前线移开;3.加剧对意大利的压力。此次会议的结果是美国利用争执得到了“美国可以利用自己在太平洋方面的军队获得对日本的主动权”的承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文件载明:美国“不仅要继续在南部和西南太平洋前进(以腊包尔为目标),而且中太平洋也要开始进攻,通过马绍尔群岛进军菲律宾”^[1](P.26)。这就意味着,美国的战略投入在北非登陆之后,不仅要进一步地受“先德”战略的制约,同时在“后日”中,也需对太平洋美军作战维持相当投入。卡萨布兰卡会议关于太平洋远东方面问题的最后结果是:1.美国在太平洋两路进攻;2.1943年重占缅甸;3.由美国空军进行空运增加对华援助。会议代表一致同意在太平洋——远东作战,以保持对日本的压力,坚守和夺取有利地位,以利于在打败德国之后发动大规模的进攻^[8](P.36)。这一决定真正落实的是在太平洋战场。马歇尔在会议中就告诫英方,“继续在地中海方面的推进,必须与在太平洋方面的大规模作战相平衡”^[8](P.37)。

1943年5月12日,美英间代号为“三叉戟”的会议在华盛顿召开。美国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拟定“全球形势估价”,并建议:“盟国继续将主要努力放在欧洲轴心国方面。”具体是:1.集中力量对付德国潜在战争能力;2.进攻西西里,实施“爱斯基摩”计划;3.从英国进行轰炸德国的“镰刀”计划;4.增援俄国;5.加强全面进攻欧洲大陆的准备^[9](P.366—367)。尽管这次会议中也强调了全缅作战支持中国的重要性,但美国的最终意图还是使英国接受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观点。5月8日,美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与罗斯福在白宫召开最后为美英军政首脑“三叉戟”会议做准备的会议。罗斯福的参谋长李海上将记载中表明:“决定美国政府的首要目标将是迫使英国同意尽早在合适日期跨越海峡侵入欧洲,为在1944年春从事这一作战作充分准备。”^[10](P.157—158)美国参加这一会议的主旨表明,如果美英之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这一主要问题上达成谅解,其他问题就有可能作出相互妥协与让步。“三叉戟”会议中,欧洲和地中海作战问题居首位。美国军事首脑利用“太平洋选择”的问题来限制英国主张的在地中海的行动,而获取英国支持横渡海峡的进攻战役。而英国则以“日本第二”的原则支持继续在西线战场作战略投入的立场。结果就英美双方来说,因为基本原则一致,都成为赢家。由于罗斯福明显同意丘吉尔首先“清除

意大利出战争”,进一步稳固地中海区域盟国战略地位的观点,这样,英国就赢得了美英继续进行地中海战役,攻占西西里的进一步战争行动的确认。而美国参谋长们也获得了在“先德”的前提下,美国在太平洋上实施“有限进攻”行动的认可^[8](P.139)。

早在北非登陆成功之时,丘吉尔就预见:“现在还不是(战争)的终结,甚至说还不是终结开始。但是,这很可能是(战争)开始的结束。”^[6](P.237—238)罗斯福则评价说:美英军队“使丘吉尔先生恰当地描述为‘轴心国的下腹部’处于易受攻击的地位”,并且解除了南美大陆的威胁^[11](第393页)。美国及英国选择北非地中海作为“先德后日”战略实施的首选之地,会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形成了对德国实施战略进攻的有利战略态势,为弥合战略“链”中的关键环节做出了贡献,使德日中东会师的危险完全消除,加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但应看到的是,美国“先德”战略的初步实施的成功,是建筑在中国的战略牺牲和战略支持的基础之上的。

二

美国开始实施“先德后日”战略,就意味着战略投入重心放在西线,对于中国战场来说,并非意味着其战略地位的下降,而是意味着直到德国败局已定的漫长时期,得不到战略投入。即是说,中国战场必须继续发挥牵制日本陆军主力在中国大陆、支持“先打败德国”战略的作用,同时在战略物资的投入上必须随时为“先德”战略作出牺牲和让位。

1942年8月14日,为适应正在拟定中的北非登陆作战计划,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战略计划者们就为大战略实施情况下对各战场的战略投入做了排序,中国排在末位的印度之后^[1](P.309)。由于美国实施“先德后日”战略的基本保证是太平洋防线的稳定,因此,美国同样也认为,中国对于日本的牵制,就可能迫使日本从其他地区,特别是太平洋南部和西南部转移兵力。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确定的“1943年在远东的行动路线”文件中阐述:“为重开至中国的供应线路,应在缅甸发动攻势以振奋中国。通过供应中国军火使其继续战争努力。”^[1](P.373)但是,美国主张重占缅甸的大规模作战明显受到英国的反对和“先德后日”战略原则的制约,不断地向后推延。1942年5月25日,史迪威向美国陆军部提出派遣美国军队到中缅印战场的要求,而美国陆军部否定了这一建议,认为派美国军队到东南亚地区,会使美国绑在这一战场之中,将这一地区作为主要战场。陆军部官员还告诫史迪威,“不要过早地提出中国所希望的重开缅甸路问题”。陆军部的态度反映了美国的战略意图,也得到罗斯福的同意^[1](P.229)。北非登陆成功后,美英在卡萨布兰卡会议文件中列入了“重占缅甸”的条款,但在具体实施这一作战的问题上,美国明显是看其是否与“先德”战略相矛盾和英国是否合作而定。

1943年2月3日,由美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通知蒋介石有关卡萨布兰卡会议精神,表示将帮助中国拟定开通缅甸路的详细计划。确定缅甸作战的时间是在1943年秋到1944年春进行,但只给了中国方面一个大体的作战纲要。纲要要求中国军队在雷多和云南,英国军队在缅甸的阿恰布和亲敦江在雨季之前向前运动准备秋季攻势。两国军队将向曼德勒出发。英军舰队在海上沿缅甸海岸集结起来进攻仰光。这种积极计划得到蒋介石的赞同。蒋介石甚至同意在英国海军支持不足的情况下也参加缅甸战^[8](P.78—79)。但是,英军在雨季前的作战被日军挫败,由此单方面取消了向亲敦江方面的进击,并强化了推延全缅作战的立场。而罗斯福在英国的坚持之下,也开始从原有立场退缩。3月30日,罗斯福和马歇尔正式表示:“增强‘波列罗’更为重要,甚至不惜牺牲‘阿纳吉姆’(即中英南北配合的全缅作战计划一作者)”^[9](P.352,注63)。美国计划者们还认为,如果日本成为首选目标,太平洋方面的船舶需求就会增加,会危及“波列罗”,因此,缅甸作战的区域限于北缅。按美国计划拟定者的观点,修改后的计划就可减少中缅印战区的海运需求,在1943年余下的时间可运送21500军队到英国,英国也可将用于全缅作战的运兵船转到“波列罗”。罗斯福对这一研究结果和改变计划的建议表示赞同^[8](P.81)。这种实际上让中国单方面承担缅甸有限作战的方案自然引起中方的强烈反应。蒋介石政府拒绝参加缅甸战,并提

出加大援华力度的要求。为了平息中方的愤懑,罗斯福指示增派30架运输机参加“驼峰”运输,并再分派一部分空军给陈纳德,但是遭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强烈反对。为缓解中方的情绪,4月1日,罗斯福通知蒋介石,他已努力增派运输机,增加每月1500吨物资给陈纳德,“驼峰”运输尽快达到每月4000吨,到夏季增至每月5000吨。罗斯福还全力支持陈纳德的空中战略计划,作为对蒋介石的支持^[8](P. 84)。可以说,全缅作战推延的根本原因是“先德后日”战略需要,而罗斯福对中国战场的补偿则是因为中国不可忽略的战略牵制地位。罗斯福支持陈纳德的“空中战略”,暂缓逼蒋介石实施缅甸作战的重要原因,就是担心中国(蒋介石政府)退出战争^[3](第555页)。1943年4月,美英联军在突尼斯获胜后,美国进而再一次确定了以欧洲——地中海为重心的基本战略,太平洋方面也要维持对日有限进攻的局面。对于中国,也确定必须给中国提供“尽可能的、最大限度的物资援助和空中支持,以保障中国继续参与战争”^[8](P. 122)。

美国“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的战略意图除了牵制日本之外,也与利用中国作为其后反攻日本的基地有关。早在1943年5月,美国就看重中国在未来反攻日本中的地位,也知道缅甸作战,特别是全缅作战是获取未来反攻日本有利地位的第一步。但是,全部问题在于,美国军政首脑的主要战略方向在德国方面,首先打败德国的原则使美国不能突破全缅作战问题的瓶颈。在“三叉戟”会议上,中美英配合的全缅作战被推延到1945年。这一决定对中国战场的严重影响从史迪威的态度就可以看出。5月13日,史迪威表示坚决反对将开通缅甸路延至1945年。中方也作出强烈反应。5月15日,宋子文告诉李海,除非进攻仰光,中国政府不会派军队进入缅甸。为补偿中国,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在秋季早期将每月给中国空运量增至10000吨。英国同意在印缅方面进行陆空作战,从阿萨姆通过雷多和英帕尔进入缅甸,与从云南进军的中国军队会合。两栖登陆规模缩小为在阿恰布和兰里岛方面实施。罗斯福最后同意英方的观点,将视线从重开缅甸路移开,而代之以建立一条从雷多到北缅的新路。而这一决定在通知蒋介石时,省去了阿恰布和兰里岛地名。总之,罗斯福在这次会上没有支持自己的参谋长们,实际也没有热望实施一项替代计划来弥补“安纳吉姆”,主要担心引出无止境的船舶运兵的要求,影响地中海战役和西欧登陆的准备。美国陆军部也拒绝了史迪威增援两个师到中缅印战场的建议,认为从西南太平洋和南太平洋转调军队应由主要战略决定,前提是不干扰欧战。美国军事首脑没有派地面部队支持中缅印地区的任何热情,如马歇尔所说,这样做可能会导致另一“牵扯”(pull)^[6](P. 142—143)。由于战略投入重心的限制,罗斯福每月7000吨援华物资的承诺此间也没有兑现。据美国陆军战史著者统计,“经阿萨姆交通线运进中国的补给品”,1943年还不到5000吨^[12](第223页)。从1943年5月的“三叉戟”会议到8月的魁北克“四分仪”会议期间,美国按既定目标完成了“爱斯基摩”计划,在突尼斯打败了德国军队,准备进攻意大利西西里岛,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南侧翼准备的作战行将完成。美军在太平洋方面推进顺利,准备转入进攻。应该说,这些都是建筑在中国战场所付出的战略代价之上的。

作为对中国战略牺牲的补偿,在1943年10月的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和11月美英中三国开罗会议上,美国力荐中国为四强之一,尽量支持中国继续发挥战略牵制作用以利于首先打败德意日这一总目标。赫尔的一段话就很能说明问题:“……四国宣言中不能排除中国。我国政府认为,中国在战争中已作为四大国之一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现在在宣言问题上苏英美三国当面将它摒弃,完全可能在太平洋地区产生极其可怕的影响,不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如此。”^[13](第113页)英国明确不同意把中国作为大国对待,但也不得不承认,这样做,“对战争是必需的”^[8](P. 139)。联系此时美国大战略实施使中国付出代价的考察,可以说美国就是希望以这种方式作为一种补偿手段。特别是屡次推延解中国之围的全缅作战,更使美国要想尽办法使中国坚持下去,同时,也要蒋介石支持北缅战役。对于美国来说,现实最为紧迫的就是维持一个既能付出牺牲又能坚持抗战的中国战场。这是美国在坚持“先德后日”战略原则的情况下对中国做一定补偿的基本原因,从另一角度讲,也是对中国战场基本战略地位的重视。

三

美国及英国从北非地中海地区开始实施“德国第一”的战略,苏联专注于对付德国之时,“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以对日本大部陆军实行战略牵制,是盟国大战略成功的基本前提之一。由于美国战略投入的重点在西线和太平洋战场,这就标志着中国战场承受装备优良的日军重压的局面在短期内不会结束,而这一艰难的历史使命仍然主要由中国自己承担。

对于“先德后日”的大战略,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具有非凡的战略视野和宽阔的胸怀。如1943年7月1日毛泽东所述:“对于中国战场,如果打倒了大头子希特勒,那末二头子日本法西斯也一定被打倒。大后方有一部分人弄不清楚这一点,不赞成先打倒希特勒,这是不对的。现在全世界结成了整个的反法西斯战线,任何国家都不是孤立作战,所以在决定战略的时候,不应只从一个国家的眼前利益来看,而要看先打败哪一个法西斯国家对于整个法西斯阵线最为有利。”^[14](第29页)中国共产党也积极为这一反映反法西斯战争规律的正确战略原则而实践,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坚持抗战,1943年间成功地粉碎了日军的扫荡,巩固了华北、华中和华南解放区,并为对日本发动反攻创造了条件^[15](第388—397页)。中共也从大局出发,希望与国民党携手共同抗战。毛泽东认为:“六年来的作战,实际上是被划分为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因此,必须增强这两个战场互相援助的作用。”^[16](第54页)在这一期间,对中国战场完成战略牵制责任的最大障碍仍然是内战危险。1943年3月,蒋介石试图发动第3次反共高潮。毛泽东于3月30日电告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关于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并指示他们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制止摩擦行动。4月6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申明对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应取守势”的原则。5月8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周恩来,强调“目前不要刺激国民党”。6月,国民党胡宗南部在洛川开会,决定调集大军分9路围击延安。对于国民党不顾抗日大局的举动,中共中央采取了有效的措施。7月6日,朱德以第18集团军总司令名义致电蒋介石、何应钦等,呼吁制止内战,维护抗战团结大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态度赢得美英苏的同情和支持。在国内外的压力之下,国民党的这次反共高潮在未形成之时就被挫败了。中共顾全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的态度和高超的应对策略,对于中国战场的继续坚持,避免在反法西斯战略实施的关键阶段中国局势出现大的动荡,意义是重大的。中国共产党非常清楚地知道,中国抗战主要靠自己独立自主,外援只能是一种辅助。1943年6月1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信中就说:“……英、美仍是集中对德、援华甚少,口惠实不至,……抗战还须三年。……我党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14](第24页)正由于敌后战场是抗击日军的最坚强战线,因此,日本在1943年间仍然将解放区作为重点攻击目标,并认为:“中共军队不仅在华北,而且在全中国都妨碍着日军的行动,……”。5月下旬,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在视察华中日军时指出:“铲除中共军队顽固地在我占领区的阴谋活动,是极为必要的。”9月1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在兵团参谋长会议上也指出:“……最近,中共领导民众的势力竟有增大的倾向,……为适应大东亚决战要求,华北方面军迅速消灭中共主力,乃为当务之急。”为了巩固所谓“绝对国防圈”,日本急于巩固华北这一后方据点和“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15](第387页)。敌后战场的积极作战和根据地的恢复,不仅牵制了日本在华陆军的半数,同时,也使日本根本没有可能进攻苏联。在1943年的日本计划中,只有对苏联动向的分析而没有任何攻击苏联的意图^[17](第713页)。

中国能在困难状况下继续发挥战略牵制作用的另一因素,是国民党正面战场较为完整地坚持。如1943年初至6月进行的“鄂西战役”,1943年8月至12月的“常德战役”等,都为中国的保持起到了积极作用。1943年2月底,日本大本营分析了“大东亚战争”形势,认为:“重庆的抗战能力将继续减弱,……还不会放弃其继续抗战的意志。”关于“重庆的抗战能力”,日本判断:“在现在的形势下,可以继续消极抗战。”所以,“不能由此而期望其抗战体制迅速崩溃”^[17](第712—715页)。5月8日,日本杉山烟参谋

总长视察南京时,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也提出:“看来要使重庆脱离美英、除武力以外别无他计。”而畑大将在8月13日的日记中也写道:“始终只为美英反攻对策所左右而致处于守势,同时又无打开难局之策。如此,难以期望使重庆屈服,惜哉!”^[18](第39—41页)

正是由于中国两大战场的坚持,使日本始终不能从中国脱身。在1942年6月太平洋进攻告一段落之后,日本将相当数量的地面、航空兵力调回中国东北、中国内地和日本国内。日本南方军共有7个师团与7个守备队,其中有5个师团在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也就是说,除了在中国的陆军主力师团外,中国战场的侧后也吸引着日本南方军的陆军主力^[17](第738—739页)。1943年9月,日本大本营估计,“在东亚,美英将同印度、澳大利亚、中国一起,日益加强对日本的压力,继续加强东南方面的反攻,并且在图谋由西南、东北两方面压缩对日包围圈的同时,从空、海两方面,加强对我占领的重要地区的进攻,以求尽快决定东亚战局的归趋。”^[19](第839页)关于“美英在东亚反攻”部分,日本大本营在9月25日联席会议中估计,盟国将对日本发动反攻,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日本不能倾全力去对付美国海上的攻势和进行缅甸战略地带的防御。如会议记录就明显表明:“对华、对苏的正面,还至少需要配备目前程度的军事力量。”^[18](第851页)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日本在中国不仅要对付坚持积极抗战的中共及其军队,同时,也确定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全面攻击的方针。在前述日本中国派遣军对国民党政府作出不会妥协的判断之后,日本中国派遣军于1943年8月28日制订了“1943年度秋季以后的中国派遣军作战指导大纲”,规定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的作战是:“华北扫共作战。华北方面军,于今秋务须长期有组织地反复对共军进行扫灭作战,覆灭其根据地。”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则从事“常德作战”、“广德作战”、“打通平汉路作战”。9月7日,日本大本营对这一“指导大纲”的答复更清楚阐明了作战意图:“常德作战极力加强对敌压迫,并牵制云南方面敌兵力他调。”^[19](第41—42页)这说明日本将不得不同时在中国两个战场进行战略作战。开罗会议时期,随着北非地中海战役的顺利完成,美英苏在西方战场方面就形成了对德国包围和反攻之势。美军在太平洋上进展顺利,并进行有限反攻,迫使日本退守“绝对国防圈”(指西起缅甸、马来西亚、经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西部、西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小笠原群岛、千岛群岛。)。盟国能顺利实施这一大战略,而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能彻底扭转各大战场的形势,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中国战场在极困难条件下的坚持。“据日方资料记载,1943年初,日本陆军总兵力约240万,在第一线作战的部队共114万,其中,中国战场66万,太平洋战场48万。”^[15](第383页)1943年,“日军共有70个陆军师团,投入中国战场者即达39个师团,占其陆军总数的55.7%”^[20](第284页),到9月,日本抽出部分兵力支援太平洋,但陆军主力仍在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无任何外援进行艰苦抗战。国民党军队所得到的外援多用于装备云南师和在印度的中国师准备北缅战役。因此,在中国战场,中日双方比较,仍是敌强我弱,力量悬殊。在这种状况下,中国战场能完成战略牵制任务,实属不易。如果不是仅从战略投入排位来判断中国的战略地位的话,应该说此间中国在全球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不仅没有减低,相反是因为艰危的环境战略责任更重。正是中国以巨大民族牺牲所进行的战略牵制,使得“先德后日”战略顺利实施有了良好开端和光明前景。

[参 考 文 献]

- [1] MATLOFF Maurice, SNELL Edwin M.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1942[M]. Washington D. 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53.
- [2] STIMSON Henry, BUNDY Mcgroge.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M].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8.
- [3] [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册[M]. 陈启迪,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4] SHERWOOD Robert E. Roosevelt & Hopkins [M].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50.
- [5] JACOBSEN Hans-Adolf, SMITH Arthur L. Jr. World War II, Policy and Strategy, 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Z]. California: American Biographical Center Press, 1979.

- [6] KIMBALL Warren F. Churchill and Roosevelt,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Vol. 1[Z].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 [7] [美]拉塞尔·F·韦格利. 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M]. 彭光谦,等译.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 [8] MATLOFF Maurice.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1944[M]. Washington D. C.: Office of the Chife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59.
- [9] HAYES Grace Person. 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 II [M]. Maryland: The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2.
- [10] LEAHY William. I was there [M].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 1950.
- [11] 关在汉. 罗斯福选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 [12] [美]詹姆斯·A·休斯敦. 美国陆军后勤史:(下册)[M]. 王军,等译.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9.
- [13] [美]赫伯特·菲斯. 中国的纠葛[M]. 林海,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
- [15] 胡德坤. 中日战争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7.
- [16]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卷[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 [17] [日]服部卓四郎.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 2 册[M]. 张玉祥,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 [18] [日]防卫厅战史室编纂.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总编:下册[Z].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 [19] [日]服部卓四郎.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 3 册[M]. 张玉祥,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 [20] 王振德.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战场[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

Initial Implementation of U. S. *Germany First* Strategy & Chinese Anti-Japanese War

HAN Yong-li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HAN Yong-li (1954-),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World War II and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bstract: The initial succes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mplemented *Germany first* strategy in the North Africa and Mediterranean was closely related to China's strategic cost and support. China bore more responsibility than that in the past because of no enough strategic supports from allied country during this time. The maintenance of China theatre still was one of essential prerequisite to the American global strategy.

Key words: United States;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China theater; strategic role